中国教育质量文化之误区反省

——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教育经历谈起

刘　尧

（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浙江金华　321004）

摘要：取得非凡成就的莫言、屠呦呦和韩春雨的教育经历极其平凡，相比之下在古代科举和现代高考中获得状元的人中多数业绩平平，这个事实颠覆了我国社会（包括教育）对人才和教育关系的习惯看法。有关科学研究也揭示了，自古“状元难入大家之列，而大家又很难高中状元”这一极为独特的文化之谜。事实上，这一文化之谜隐藏着业已存在千余年的“人们追求的优质教育，难以培养杰出人才”的文化悖论。要解析这一文化悖论，需要从反省我国教育质量文化之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误区入手。

关键词：教育质量；教育质量文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

中图分类号：G459，G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380（2016）04-0043-05

Rethink on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Quality Culture of China´s Education

—A Talk on the Education Experiences of Chinese Nobel Award Winners

Liu Yao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Review,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Abstract: Mo Yan, Tu Youyou and Han Chunyu all got great achievements, but their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were quite popular. And also, the best ones in ancient palace exams and contemporary exams for the entrance of higher education almost did not have great achievements. The comparison overthrew the social (including educational) viewpoint to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lites and education. Some scientists have revealed the reason why these first ones in ancient palace exams cloud not be outstanding persons, and those famous elites could not achieve the number ones in exam. The conclusion explains a dilemma that people all promote quality education, but the quality education cannot cultivate excellent people. To find the solution of the dilemma,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rethink the educational quality culture that includes spiritual culture, material culture, system culture and cultural behavior.

Keywords: Educational quality; Educational quality cultural; Spiritual cultural; Material cultural; System culture; Cultural behavior

收稿日期：2016-06-29，**修回日期：**2016-07-20

2012 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填补了中国大陆诺贝尔奖的空白。2015 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实现了中国大陆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梦想。2016 年 5 月 2 日，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在《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杂志上发表了一篇《NgAgo DNA 单链引导的基因编辑工具》的成果，有望媲美甚至超越当下一直是诺贝尔奖热门的美国 CRISPR-Cas 9 技术。CRISPR-Cas 9 被认为是第三代基因编辑技术，韩春雨的成果堪称是“第四代”技术，因此他被业界誉为距离诺贝尔奖最近的科学家之一。[1]不仅如此，韩春雨的成果是首个“中国创造”的尖端生物技术，打破了外国基因编辑技术的专利垄断，实现了中国原创高端生物技术零的突破。

如果我们承认诺贝尔奖是世界最高水平之奖项的话，那么获得或有望获得这一殊荣的人就是世界顶级人才。按照我国社会(包括教育)对人才和教育关系习以为常的看法，这些人应该是接受了最优质教育，即有名校背景、有留学经历、有博士学位等等。然而，令人感叹的是，莫言只接受过五年基础教育，以小学毕业的学历开始创作、发表大量作品，尽管以后在部队里参加过高等教育，但不算是正规教育，莫言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屠呦呦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没有发表过 SCI 论文，一无博士学位、二无留洋背景、三无院士头衔，被称为“三无”科学家，却是中国大陆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第一人。韩春雨连续十年没有发过重要论文，一无名校背景、二无名气、三无职位的“三无”副教授，被称为“非知名”学者和“诺奖级”科学家。

实际上，取得非凡成就的莫言、屠呦呦和韩春雨等极其平凡的教育经历，对照在古代科举和现代高考中获得状元的人多数业绩平平的事实，已经颠覆了我国社会(包括教育)对人才和教育关系的习惯看法，起码打破了我国社会崇尚的教育“出身论”“留洋论”“条件论”等等。有人因此痛心疾首地批评，中国所谓更优质的教育，实质是更加束缚学生创造力、想象力的教育，等等。有关科学研究也揭示了，自古“状元难入大家之列，而大家又很难高中状元”[2]这一极为独特的文化之谜。笔者认为，这一文化之谜隐藏着业已存在千余年的“人们追求的优质教育，难以培养杰出人才”的文化悖论。要解析这一文化悖论，需要从反省我国教育质量文化之误区入手。

一、教育质量文化及其构成要素解析

质量文化概念是菲利普·B·克劳士比提出的，当初主要在企业文化的范畴进行研究和运用。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被逐渐引入到教育领域，从此拉开了教育质量文化研究的大幕。关于教育质量文化有多种说法，本文不予赘述和评论，在此仅依据文化学关于文化的认识、教育文化学关于教育文化的认识，对教育质量文化及其构成要素进行概述。

一般来讲，教育质量文化是指社会以教育质量为核心的价值观念、规章制度与行为方式的总和。它是关于教育质量的文化，通过春风化雨的方式影响社会成员的教育观念和行为取向，从而产生对社会主流教育质量观念、标准和行为的认同感。教育质量文化与文化和教育文化的构成一样，是由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这四要素构成。[3]

精神文化是教育质量文化的灵魂，集中表现为社会主流教育质量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教育质量思想、教育质量理念、教育质量价值等等，是关于教育质量认识与看法的总和。精神文化的形成，既需要教育质量思想的传播、交流、碰撞、接受和创新，又需要在教育实践中接受检验，不断地深化和发展。

物质文化是教育质量文化的载体，集中表现为教育领域活动的人在教育活动过程中使用和创造出来的物质成果，它是从事教育活动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如：优良的师资队伍、雄厚的图书资料、先进的仪器设备、高雅的校园环境和充足的教育经费，以及保障教育活动开展的各种教育教学组织、学会、协会、基金会及开展的活动等等。

制度文化是教育质量文化的主体，集中表现为教育活动中形成的一系列质量管理规章制度的总和。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教育质量管理的规则与规范。主要是质量方针、质量政策、质量规范等，具有明显的规范性、强制性和稳定性特征。二是教育质量的运作机制。主要表现为质量流程、质量监控、质量保障等，具有明显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创新性特征。

行为文化是教育质量文化的机体，即社会成员在参与或衡量教育质量活动中所贡献的、有价值的、促进教育质量提高的行为方式，集中表现为社会成员追求教育质量的行为及其方式。或者说，是指社会成员将教育质量观念落实到教育质量活动中的行为方式，具体表现为社会成员在教育质量活动中所选择的行为及其方式。

二、精神文化深陷读书做官的价值取向误区

“学而优则仕”出自《论语·子张》,其大意是读书人有了余力,可以出仕为官、报效国家,在为国家效力的过程中,推行儒家的“仁政”思想。孔子说过,“学而时习之”,出仕则是“时习之”的路径之一,就是把修身学习获得的知能用于出仕为官的实践,不至于修身学习脱离社会实际。人的一生修身学习是无止境的,出仕为官也是更好地修身学习,这也是学以致用。

在孔子那个时代,“学而优则仕”还仅仅是一个政治号召,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到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就成为官方思想, 特别是隋朝设立科举制度之后,“学而优则仕”则成为统治者对知识分子所抛出的“橄榄枝”,久而久之就成为知识分子自觉的理想追求,对中国文化教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4]

自此,“学而优则仕”渐渐演变成了“读书做官”。明代有小说曰,有位美女名叫颜如玉,一位白面书生玩命读书,金榜题名,最后抱得美人归。这就有了流传至今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名言。它不仅是国人对教育作用的浓缩,也激励着读书人发愤读书,追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逆转。

“读书做官”作为社会意识和价值取向,被国人视为教育的最高价值和终极目标,读书人获得官位的大小,也被当作教育价值大小的衡量标准。在古代中国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官为百业之首,唯有走上仕途才算出人头地。处于社会底层的庶民,只有入仕才能摆脱贫困和低贱的社会地位,实现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的理想,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如果说古代中国崇尚“读书做官”的话,那么当今中国“读书做官”依然深入人心。不过,历经时代的变迁,“读书做官” 已被转化为一种明确且浮躁的期待——“成功”,即人们希望通过教育尽快实现向上层社会流动,获得更高地位、获取更多金钱。一部分人以地位和金钱衡量成功是没有错误的,但当它成为当今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时,尤其是当作接受教育的动因时就大错而特错了!

正因为如此,20 世纪 80 年代“官本位”一词出现,并逐渐走向兴盛……“官本位”指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以“官”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以是否为官和官位高低的衡量标准。2011 年,人民网调查显示,67.5%的网友表示“自古‘官本位’难消除”。[5]从“读书做官”到“官本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教育的价值取向。

三、物质文化深陷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误区

2012 年 5 月 29 日《都市晨报》报道,未满 30 岁的河北馆陶县第一中学高三年级班主任赵鹏服毒自杀。赵鹏留下遗书称,每天无休止的上班让人窒息,工资只能月月光。据悉,赵鹏每月只有 1 450 元基本工资,而此时的“最美女教师”张丽莉没有编制、没有医保,每月薪水仅为 1 000 元。人们唏嘘,在全社会尊师重教的环境中,为什么还会有教师“穷死了”?

还有一个更令人悲哀的现实是,一个恶性循环与代际传递的悲剧:上一代作为农民工进城,把孩子留在家中成为留守儿童,得不到好的教育。农民工的下一代长大后只能继续当农民工, 贫困在继续代际传递。有格言说得好:每关闭一所学校,就可能增加一所监狱;每增加一所学校,就可能少建一座监狱。教育资源何时投到这部分人,不只消除贫穷还能稳定社会。

就在 2012 年,从全国“两会”上得知,呼吁了多少年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 4%的目标终于实现了。尽管如此,我国教育投入的功利主义没有根本改变,到今天教育资源分配上的马太效应依然,有些孩子能在教育体制中吃到肉,有些孩子却连肉汤也喝不着。频频出现的“天梯上学”“索道上学”“竹排上学”媒体报道,就是教育投入不均的生动写照。

早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就流行“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口号。教育是百年大计,“再穷不能穷教育” 体现了我国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思想;“再苦不能苦孩子”表达了我国为孩子成长创造良好教育环境的美好愿望。一边是教育投入总量的不断增长,一边又是教育投入的功利主义产生的马太效应,“再穷不能穷教育”在一些地方仍然流于口号。

然而,教育资源优越的地方,更容易获取优先分配的机会,以至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教育浪费现象惊人。2012 年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鲍义志“爆料”称:我国校园浪费现象惊人,大学校园存在八大浪费现象,依次为用水浪费、用电浪费、食物浪费、纸张浪费,等等。[6]比如,据网上曝光,一些学校建“豪华门”

等奢侈浪费现象广受社会诟病,其造价动辄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

2013 年 2 月 28 日《京华时报》报道,教育部发出“关于勤俭节约办教育, 建设节约型校园的通知”强调,不得搞豪华装修,坚决杜绝“豪华校门”。政府出台政策杜绝教育浪费是必要的,而变革教育资源分配上功利主义,抑制马太效应进而推进教育公平则显得更为重要。为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入学,一些大城市政府采取了很多积极措施。但毕竟门槛过高,还有不少儿童被拒校外,即使入学了,其遭遇与城市儿童还是不同。尽管政府采取了许多扶持政策来解决实际存在的教育不公问题,但这还不够,还需要寻求根本的解决办法。

四、制度文化深陷科举制度的考试选拔误区

科举制度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从隋朝大业元年(605 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前后经历了一千三百余年。科举制度建立之后,从制度上打开了读书人通过勤奋读书走向政界的道路。自此,“学而优则仕”不仅成为一种社会现实,也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观念。

科举制度以“学优”为唯一标准,这在朝廷选拔人才方面体现了公平和公正。只要学习成绩优异,不问出身门第,可以中举人进士,可以入朝为官,从用人制度上看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出身庶民的知识分子有了可能的进身之阶。正因为长期施行科举制度选拔官员,“学而优则仕” 渐渐被社会误认为 “读书只为做官”,对社会文化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科举制度为国家选拔了优秀人才,也开启了学校教育的应试之风。在科举制度实施之初,确实为国家选拔了大批仁人志士, 可是随着朝代更替的不断演变,也导致学校教育重文辞而少实学、重记诵而不求义理,形成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应试学习之风,以致后来出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范进中举”等畸形学习观和荒唐故事。

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 科举制度也被废除了,但其影响还远远没有消除。科举制度的文化惯性依然是我国近现代教育改革的文化阻力。大量事实证明,考试分数在国人心中的分量很重,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也始终认为, 只有考试分数才能够体现教育质量,才能够反映学校的教育成绩,甚至有人认为考试分数是教育质量的唯一体现。

新中国的教育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科举制度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做法依然得以保留。当今高考所引发的社会焦虑,很大程度上是国人被迫参与到同一个高考之中,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因为高考是当代中国实现社会流动的唯一机制。考试选拔制度是我国的文化遗产,是科举制度融入民族文化的显著标志。今天,考试选拔制度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因此, 不少人把考试选拔制度依据的考试分数等同于教育质量,尽管这无疑是对教育质量的误解,但现在从地方政府领导到学校教师、家长都认为考试分数就代表教育质量。如果仅依据考试选拔制度的逻辑,教育过程就成为一个竞争与选拔过程, 教育也蜕变为一种考试竞赛的活动。这显然与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相背离。

五、行为文化深陷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误区

《管子·权修》有云:“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人才培养乃国之大事,探索并建立适应时代发展、适应国情民意的新教育体制,说易做难,任重而道远。从近现代中国教育的起步来看,其目的便是试图适应新形势,培养全面自由发展的新人,但很遗憾,教育宗旨并无变化,还是培养经世致用之人才。

经世致用这一教育思想把教育仅局限于培养实用人才,压抑了学生对宇宙终极真理的探求和进行这种探求的兴趣,使教育走向世俗乃至庸俗,[7]学习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阶梯。由于人人追捧致用之学,缺乏对终极真理的追求,难以养成钱学森所说的“杰出人才”。由于受经世致用思想的桎梏,我国再没有对人类做出类似于“四大发明”的贡献。

我国传统教育所固有的经世致用思想,在新的社会发展和历史境遇中被极大地激发和强化了。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和社会转型中,无论洋务派的官僚还是维新派的志士都高扬“教育救国”的大旗,主张变科举、立学校、兴西学,其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原因就在于抱着经世致用思想不放,不积极追求终极真理,而仅仅安于向西方学习。

近代中国兴新学的主张,重视的是富国强兵的技艺之学。教育被视为经世致用人才的研发手段,被赋

予了强烈的技术主义、国家功利主义价值，学生成为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现代中国“教育兴国”“教育强国”战略，与近代中国“教育救国”运动的经世致用思想一脉相承。如果今天我国依然仅仅张扬教育的经世致用价值，那么“教育兴国、强国”依然是个难题。

2014 年 6 月 18 日，中国校友会网发布《2014 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针对 1952—2013 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近 3 000 名高考状元的求学与职业等状况，展开的追踪调查及研究。结果显示，在高考状元志愿选择中，就读经济学、工商管理学等“赚钱”热门专业的人数最多，而农学专业没有一位状元报考。状元青睐“赚钱”专业，就是经世致用思想的个体体现。

从古至今，由于我国教育片面强调经世致用，导致教育功利化日益泛滥，学校也由一方净土变成人人追名逐利的角斗场。无论教师的教还是学生的学，多是出于追名逐利的目的，教育背离了“立人”的宗旨。教育功利化引导人片面追求利益，对精神成就较少关注。这种教育培养的人不再拥有丰富的精神世界，而成为追名逐利的人才。

六、教育应追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20 世纪初，现代教育形成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两重价值、目标和二元结构。作为现代教育的两翼，这两种教育价值相辅相成，保持教育协调健康地发展，防治教育的失衡和异化。[8]鉴于此，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协调教育对国家的两重价值，以及在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协调教育对人的两重价值，是我国社会现代化面临的挑战。

工具理性是指把追求教育外在价值作为目标的行动意向；价值理性是指把教育内在价值作为目标的行动意向。工具理性关涉理性化，其核心是对教育效率的追求；价值理性关涉人性化，其核心是对教育促进人全面自由发展的追求。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性的存在提供基础，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提供精神动力，并主导着工具理性的发展方向。

有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教育的价值取向，一向呈现出工具理性凸显、价值理性式微的状态。到了近现代，中国教育依然是工具理性的过分张扬、价值理性的日渐衰落。当今中国随着素质教育的实施，呼唤教育价值理性的回归，已成为素质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具体说，素质教育应该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寻求平衡和张力。

教育是关涉理想的活动，是介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具有鲜明的理想指向的实践活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构成教育的内在逻辑与质量的根本性依据，离开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教育的一切功利目的实现也会大打折扣。[9]因此说，教育应具有乌托邦的精神品格，坚持非功利的价值理性追求，与功利的世俗社会保持一段距离。

我们强调，教育价值取向应摆脱工具理性的牢笼，并不意味着要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对二者进行有机的协调和整合。因为离开工具理性的教育一定会远离社会，失去大众和社会的支持，从而缺乏生机和活力；而离开价值理性的教育则会变成急功近利的社会活动，失去精神和灵魂，从而难以发挥引领社会的作用。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任何一方面的单边发展都会导致非理性，只有把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有机结合起来，才是教育要追求的理想境界。因此，要改变我国教育过于追求功利的现状，就要树立全新的教育价值观，真正认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有机结合的效用；在实践层面要扭转过去只重工具理性的状况，突出价值理性的建构。

参考文献

[1] 郭伟.对话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N].河北日报,2016-05-13(05).

[2] 刘尧.破解杰出人才培养的知识评价困境[J].大学(学术版),2013(2):86-93.

[3] 刘尧.论作为教育评论客体的教育文化[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3):99-104.

[4] 罗安宪.“学而优则仕”辨[J].中国哲学史,2005(3):31-38.

[5] 林卡.中国官本位深层肌理解析[J].人民论坛,2013(10下):62-64.

[6] 江跃中. 全国政协委员直指大学校园八大浪费现象[EB/OL]. 新民网,(2012-03-09).http://shanghai,xinmin,cn/xmsz/2012/03/09/13964217.html.

[7] 顾则徐.中国教育大病在唯经世致用主义[EB/OL].共识网,(2012-04-10).http://shanghai.xinmin.cn/xmsz/2012/03/09/13964217.htm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gsbh/article_2012041057292.html.

[8] 王萍.高等教育要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整合[J].教育探索,2010(10):9-11.

[9] 刘尧.走出“高质量教育”迷途[J].民主与科学,2015(1)26-30.